

# 武昌起义后清、袁、孙妥协原因述论

丁健, 李金全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西安 710062)

**摘要:** 武昌起义后, 清、袁与孙处于敌对地位, 势不两立, 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他们由对立到妥协, 这颇值得思考。关于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 相关著述十分丰富, 但也并非因此而无研究的价值, 其中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历史末节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清、袁、孙之间的妥协并非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 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 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的基础, 又有主观条件, 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

**关键词:** 武昌起义; 袁世凯; 孙中山; 清皇室; 妥协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0)01-0122-05

清即没落的清皇室, 袁即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 孙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势力, 清、袁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本属同一营垒, 但却同床异梦; 孙为非既得利益集团。清、袁特别是清反对任何剧烈的政治变革及其可能导致的权力再分配。孙则倡导以暴力推翻清朝专制政体, 建立民国。于是清、袁与孙处于敌对地位, 势不两立, 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他们由对立到妥协, 颇值得思考。关于辛亥革命中清、袁、孙之间的妥协, 相关著述十分丰富<sup>①</sup>, 但也并非因此而无研究的价值, 其中仍然还有很多细微的历史末节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对这一问题进行再阐释, 并非提出新的观点, 拿出新的证据, 而是试图从整体上把握武昌起义后中国政局演变的内在理路, 以求更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清、袁、孙之间的妥协并非以哪一派政治势力的意志而转移, 而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各方理性认识时局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妥协, 是因为妥协既有现实基础, 又有主观条件, 还有积极促成的内外因素。正因如此, 国内局势不是转向乱的方向, 而是很快稳定, 人们少受战乱之苦, 社会避免经济的崩溃, 国家避免了外来的干涉, 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我们看问题, 不能仅仅从结局着眼, 更重要的是

要分析过程, 更不能以后见之明, 先入为主, 任意臧否历史和历史人物。

## 一、妥协的现实基础

辛亥政争中, 清、袁、孙之间的妥协, 既不是被逼的, 也不是由衷的, 是在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多种因素促成的, 妥协是相互的, 而且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 (一) 国内秩序混乱

武昌起义后, 在汉口, 英文《汉口日报》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鄂省银行焚毁, 武昌城外抢劫, 德租界后面的骚扰, 通宵都可以听见全市的枪声, 杀戮武昌满人, “有可靠消息, 凡是未能逃出武昌的满人, 革命军碰见必行枪击。据说, 如果经过从一数到十的考查败露了, 全家包括妇孺都被杀死, 因为这种方法对于辨别满人与南方人是很可靠的。电讯中断。”<sup>[1]</sup>在南京, 衙门焚毁。北京, “北京城中今夜有大火数起, 大局异常危急。”<sup>[2]</sup>“京中恐慌日甚, 日来由京逃出者共二十万内贵族甚多, 昨日有特别车辆载显贵多人前往天津。”<sup>[3]</sup>“北京充满了荒诞的谣传”。<sup>[2]768</sup>“居民出京者相继, 火车不能容, 天津船少, 不能悉载。内外城戒严。”<sup>[3]</sup>汉人害怕满人报复而出走, 满人害怕将来的下

收稿日期: 2008-04-27

作者简介: 丁健(1978—), 男, 博士研究生。E-mail: dingjian6@126.com

①遗憾的是既有的研究成果由于受“革命史观”的影响, 史实论述都纳入“革命史范式”, 并不能真实准确反映历史的全貌。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研究也有不断的进展, 相关研究参见: 张华腾. 《对立中的统一: 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北洋集团关系述论》, 《江海学刊》, 2006年第1期; 张华腾. 《统一中的对立——民国元年同盟会、北洋集团的合作与斗争》, 《历史档案》, 2006年第2期; 张华腾.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 《民国档案》, 2004年第2期; 夏斯云.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拥袁反清策略新论》,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丁健, 马丽. 《辛亥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处境的两难》, 《井冈山学院学报》, 2007年第7期; 丁健. 《辛亥革命中的清袁孙妥协》, 《宜宾学院学报》, 2009年第2期; 农伟雄. 《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 《江汉论坛》2002年第2期; 季云飞. 《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学术月刊》, 1989年第4期; 尹全海. 《袁世凯攘权考论》,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姜新. 《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年第4期; 侯宜杰. 《如何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等。

②译电. 申报, 1911-11-10, 第1张第3版。

③译电. 申报, 1911-11-11, 第1张第5版。

场而出走。局势一片混乱,人心惶惶。在上海,“居民自闻民军占领上海,异常恐慌,纷纷迁徙,有赴乡者,有出城暂避者,大有不可终日之势。”<sup>①</sup>在山西,农民“捣毁警局,焚烧学校”<sup>②</sup>等等。据统计,“从武昌起义至1912年底,全国较大的农民起义达150多起。总的看来,随着各地的光复独立,农民的斗争不断高涨。”<sup>③</sup>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确立。而无处不在的谣言,无疑使局势雪上加霜。由乱就可能生变,一变局势就很难收拾,无论是清、袁,还是南方的革命党人都不愿意看到局势的失控。

## (二)经济方面南北双方都受到经济危机的困扰

清政府已威信扫地,官吏士民纷纷取款。由于大量的取款,“财政恐慌就要在北京发生了。国库储备的白银不足一百万两,可以肯定它无力支付官员的俸禄。而失信又会加深财政恐慌。”<sup>④</sup>袁世凯也为局势难以驾驭而头痛,为筹款忙得焦头烂额。《申报》多次记述了袁世凯当时的筹款活动。“袁世凯现仍竭力运动借款,且求某公使暂借四万两以应急需,某公使尚未允。”<sup>⑤</sup>“袁世凯近因国库将罄外债无望,屡向清贵族捐款,奕劻已捐助二百万,仍不敷用,颇为焦急。”<sup>⑥</sup>等等,不一而足。

南方的革命阵营也同样面临财政压力,当时,各海关早被清政府抵押给了外国人,西方列强又拒不贷款给临时政府,而国内的关税、盐税、茶税、捐税和大部分田赋又都被独立各省地方政府截留,革命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往往是仅靠发行一些公债、军钞等来应付,结果是杯水车薪,也难以救急。李书城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禁感慨:“当时最困难的是南京拥有十余万军队,军费没有来源”,“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了,乃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20万元,暂维现状”。结果发生了兵变,“经过这次兵变我才认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sup>⑦</sup>作为革命政权的最高军事指挥陆军总长黄兴筹不到军饷,穷于应付,也毫无良方,“见克强兄以空拳支柱多军之饷食,……寝食俱废,至於吐血”。<sup>⑧</sup>尽管革命派发动了这场革命,但当他们面临如此混乱的局面时,也很无奈。

总而言之,南北两方均为筹款发愁,缺乏再战下去的经济基础,因为“革命党的财政匮乏和北京政府一样灾难深重”。

再次,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再战下去。

一位外国研究者指出“内战的持续,不可避免地导致大清帝国权力的进一步削弱,也增加了外国干涉的危险。特别危险的是,俄国和日本可能乘机浑水摸鱼。中国的领袖人物,无论是民党或帝党,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无视这种可能。”<sup>⑨</sup>

事实的确如此,武昌起义爆发不久,虽然革命军一再宣布保护外国人的利益,但武汉江面上的外国军舰不断增加。章开沅先生有过考证:武昌起义不过10天,集中在武汉江面的军舰即达16艘之多,至11月中旬,侵入中国领水和领海的外国军舰竟达51艘,驻在各口岸租界的军队也陡然增加。<sup>⑩</sup>这些军舰和军队都处在戒备状态,一旦有发生侵害外人生命财产的事件,列强就可能进行军事干预。“他们口称‘静观事态演变’,实则窥伺时机,极欲宰割分肥,其中,俄日两帝尤为贪婪,活动更加诡秘炽烈。”由于中国政局大乱“英俄等帝国主义企图趁此进一步扩大在华侵略权益和势力范围。沙俄加紧了早已进行的分裂中国蒙古,制造外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sup>⑪</sup>法国表示“在一切方面,支持俄国,有关它在中国北部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不仅伸展至满洲北部,还伸展至蒙古及新疆。”<sup>⑫</sup>“愿意满足俄国的愿望”<sup>⑬</sup>当时“蒙古、西藏已因俄英的煽动实行独立,日本高唱对华干涉,准备与俄国分有东三省。”<sup>⑭</sup>决定“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sup>⑮</sup>并让驻奉日军“拟暴动时即起而干涉”。<sup>⑯</sup>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各个独立的政府控制之下,中央的威信已不复存在,各地方政府又不能保证不会发生侵害外人的事件,列强随时都有干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双方都不得不考虑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地方也迫切希望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如果再战下去,中华民族将会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 (三)舆论呼吁尽快议和

当时的报刊呼吁南北尽快议和,达成统一。“议和”、“和议”、“和平”等字眼屡屡见诸报端,由此可见,人们渴望和平的愿望是多么急切。“今日之议和以共和为大前提,能共和则和议成,世界受和平之福,不能共和则和议绝望,同胞重罹锋镝之危。”<sup>⑰</sup>“和议之中止已数日矣,乃万口嗷嗷,万目睽睽,都希望……20世纪中国共和二字,可遇而不可求者然。呜呼抑独何也。”<sup>⑱</sup>湖南都督谭延闿,电“南京大总统,陆军部长,上海伍外长,武昌副总统,各民省都督,荆州岳州各路总司令公鉴,昨接陈都督效电及南昌马都

① 苏台戒严情形. 申报,1911-11-06,第1张后幅第1版。

② 专电. 申报,1911-12-17,第1张第3版。

③ 专电. 申报,1911-12-23,第1张第4版。

④ 共和篇(二). 申报,1911-12-24,第1张第3版。

⑤ 辟袁. 申报,1911-12-25,第1张第3版。

督巧电,福州孙都督好电,以停战议和。”<sup>①</sup>于右任等组织的全国会议团通告书也希望尽快恢复和平,“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盼切盼切。”<sup>②</sup>《大公报》言:“为今之计,莫若即行停战,选定地点,召集各省各藩属举出国民代表,开国民会议,将中国前途问题付诸公决。”<sup>③</sup>当时一般民众心里莫不主张议和,胡汉民后来也回忆道:“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议和。逆之而行,乃至不易。”<sup>④</sup>

## 二、妥协的主观条件

对清、袁、孙来说,妥协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还具有可行性。

### (一)革命党人愿意议和

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支持和谈。1911年11月21日,他与《巴黎日报》记者谈话时就表示:“现在革命之举动,实为改良政治起见……以和平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sup>①</sup>孙中山到达香港,又对胡汉民、廖仲恺说:“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为也。”<sup>②</sup>孙中山归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就致电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sup>③</sup>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在复直隶、河南谘议局电中再次重申:“临时政府惟一目的在速定共和,本总统受职誓言,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条件,……南北既可调和,则生灵免于涂炭,不分畛域,自是平等之本怀。”<sup>④</sup>1月29日,在复伍廷芳电中又强调:“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和平之手段,达共和之目的。”<sup>⑤</sup>这表明孙中山是赞同议和。黄兴黎元洪早都与袁世凯建立联系,甚至都曾以大总统相许,固然也赞成议和。

此外,也有很多革命党人对议和想不通,甚至反对议和。他们主张坚决同袁世凯斗争到底,时人谭人凤也不无感慨:当时革命军“兵力不可谓不厚”,“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为瓮中之鳖矣,岂能操必胜之算哉。”<sup>⑥</sup>柏文蔚也认为:“以目前革命气势正在高涨,北伐军事不应停止,且北洋军实力尚在,应利用当前革命优势,予以严重打击,将所有障碍扫除……尤其当时和平空气浓厚,余之不放弃无力主

张,已不为各方面所重视,诚所谓曲高和寡者也。”<sup>⑦</sup>陈炯明从开始就反对仅仅以议和求得圆满结局,主张北伐。并且指出,革命党人必须提防袁世凯,“袁氏阳托议和,阴谋聚兵,在在皆有证据,停战期万不可再展,应请伍、温两公发最后通牒,限袁氏于阳历十五日以内将前议各项确实答复或所答复不尽如民国所主张,即当开战,炯明已准备大兵两镇率赴前敌,共捣虏巢,幸毋迁延堕袁奸计。”<sup>⑧</sup>当时,有的想不开,甚至沮丧、痛哭,扬言让讲和的讲他们的和,大叫“谁主和,谁吃刀!”<sup>⑨</sup>针对反对声浪,孙中山还急忙解释:“前日之袁君,为世界之一人,今日之袁君,为民国之份子。量才而选,彼独贤劳,正我国民所当慰勉道歉,责之以尽瘁,爱之以势诚者。总统既非庸庸之具,袁君即为任劳之人。宜敬观其从容敷施,以行国民之意,使民国之根基,由临时尽力维持而巩固焉。”<sup>⑩</sup>

### (二)袁世凯、清王室也赞同议和

袁世凯既是议和一方的主持人,也是议和的促成者。没有袁世凯的主持参与,议和是无法进行的。事实上,在武昌起义之初,袁世凯就有自己的打算,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革命,绝无起用的机缘;镇压了革命,也难免落个兔死狗烹的结局。清政府用他,是因为他有一支受他控制的北洋军。没有了北洋军,他也就无物可恃。在清廷授予他前线的军事指挥大权后,袁并不是真想为清廷卖命,而是一方面谕令军队大举进攻汉口作势,一方面于秘密派遣道员刘承恩致书黎元洪言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一,他把汉口汉阳攻破之后,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没有这样做。二,当张勋在南京受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援救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也没有这样做。”<sup>⑪</sup>陈夔龙忆及当时的情景说:“当项城之由鄂北上也,行使内阁权力,前方军事责成冯国璋督办。冯军先占汉阳赫山,拊龟山之背,汉城收复,指日间事。项城京寓电话处学生与津署电话学生本系素识,私电传来,余喜甚,以正式电话询之项城。诘复电云:‘未得鄂中确息’。其志不在恢复,可为骇异。迟之又久,始悉汉阳也已克复,余急电冯,请其率得胜之军直捣武昌。冯复电谓,汉口江岸缺少船只,不能径达省城,且奉京电,已有英国公使出任调和,北军暂在汉阳驻扎,不得跨越雷池一步。余闻之愤怒,急电项城,略云:‘所谓调和者,两方居同等地位,使各有开议资格。现今革党皆我臣民,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威。我军已得汉阳,与武昌仅一江之隔,党人已闻风丧胆,汉江沿岸,船只何止千艘,顷刻即可飞渡。武昌若复,中外人心大定,沿江下游各省亦

①公电。申报,1912-1-25,第1张第2版。

②咨议局电陈救危政见。大公报,1911-11-20。

③广东都督电。申报,1912-1-14,第1张第4版。

得所屏蔽,不至望风而靡。即为应酬调人起见,何妨俟武昌收复后再行开议,声势既壮,折冲尊俎,尤易为功。’项城无从置喙,但云:‘既经英使调处,不宜径行用兵。’”<sup>[23]</sup>张国淦也认为:“以项城才略经历,自属过人,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于项城之主持……经此酝酿,仍促成南北议和之局。”<sup>[24]</sup>早在汉阳失陷前,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就发现,“闻官军将士盛传和谈之说,官军方面似极希望和谈成功”。<sup>[25]</sup>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报告伦敦“袁世凯急欲设法令有此种(案指议和)会议”。<sup>①</sup>“《文汇报》北京电云:德文报代表前日往见袁世凯询问意见,袁曰:余出山之初,即思与民军和平解决,以免战祸,故有此次与民军议和及暂时停战之事。”<sup>[18][25]</sup>皇太后也多次在谕旨中表明不愿民众生灵涂炭,渴望南北和谈。这些都表明,清政府,袁世凯都没有与革命军一直战下去的想法和打算。而是主张南北言和。

### 三、妥协的内外因素

以英国为首的多数列强,国内立宪派为了经济、政治利益,也需要中国尽快结束政争,稳定局势。西方列强、立宪派的活动,也直接间接影响到南北双方的妥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起到推波助澜的能动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就迫使清、袁、孙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得不做出妥协和让步。

从一开始,帝国主义就想控制中国的局势,希望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事情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几乎没有招架之力,一省接连一省的独立,革命的烈火影响几乎整个中国。这与整个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格格不入,于是他们不是听任中国事态的自由发展,而是多次与革命派,与袁世凯,与垂头丧气的清王室接触,连线,调停。当这些不能很好地奏效时,立刻对各方或一方施加压力,促使整个局势平稳,保证在华既得利益的实现。帝国主义国家多次联合向南北双方发出照会,强调“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呼请双方代表团注意,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sup>[26]</sup>1911年12月20日,“驻沪英日德美俄法六国领事,约同访伍、唐两代表,以德领事为领袖,交其意见书。大致谓:‘驻京某国使馆,奉本国政府训令,向议和使陈述私见,某国政府,以为中国如果继续战争,不特有危本国,并有危于外人之利益及安宁,现某国政府依旧严守中立,但不得

不为私交上之忠告,愿两议和使设法,将战事早日消灭,从两造之所自愿,办理一切事宜。’”<sup>②</sup>《申报》载:“英美德法日俄六国前日有同文通牒,致送清内阁,略谓两军交战以来,各国在清商务颇受影响,此次上海媾和必须双方让步。”<sup>③</sup>1912年2月11日,“驻京外交团由英使朱尔典领衔照会袁内阁,催请速向民国政府商定一切条件,务于年内和平解决,颁诏施行,以免中外商民皆受损失,袁世凯接此照会,复与庆、醇等会商一次,随即照复英使,声言一切条件,两方逐日磋商,大致均将就绪,但有一二目,南京政府尚有未允承认之处,贵公使既有希望和平之意,即致电劝勉南军迅即应允,以维大局。”<sup>④</sup>这都反映出,帝国主义更多的是对南北双方下命令。

武昌起义后,由于南北双方都需要帝国主义的支持,革命派需要帝国主义,并通过帝国主义向北方传达南方的态度;袁世凯需要帝国主义,并利用帝国主义为自己造声势;清王室需要帝国主义,并希望帝国主义维持中国现状,尽最大限度保持自己的权益。正是因为南北双方都买帝国主义的账,也都希望和平解决国内事态,所以帝国主义能够在南北双方担当调停人的角色。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

立宪派也积极促成南北妥协,一面派人与革命党联系,一面又劝袁世凯和皇室亲贵,出力可谓不小。代表人物“张謇、赵凤昌等的介入对和谈结果的影响举足轻重。这些人既看到民主共和的浪潮不可遏止,同时又希望由像袁世凯这样的实力人物稳定政局,因此在和谈过程中不仅幕前、幕后活动频繁,还与袁暗通声气”。<sup>[27]</sup>辛亥革命二十七年之后,赵凤昌逝世,刘厚生曾撰文一篇,虽然“稿已遗失,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齐舍,满座宾朋,呱呱民国,兹于诞生’殆纪实也。当时戏赠凤昌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位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sup>[22][82]</sup>联系当时的史实,立宪派的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刘厚生评价是再恰当不过了。

帝国主义和立宪派一硬一软,一外一内,道不相同,志却相同,对南北之间的妥协影响实在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和立宪派,更多的是站在袁世凯的一边,为袁捧场,替袁说话,对清王室施加压力,对革命党人“中立”,似乎帮袁世凯扫清爬上总统宝座路上的一切障碍,助产、催生出一个“新的”政局,不是袁世凯天生就让他们青睐,实在是时势使然,利益使

①纪袁世凯之谈话. 申报,1912-01-03,第1张第4版。

②中国大事记. 东方杂志,1911,8(10):6.

③要闻. 申报,1912-01-05,第1张第4版。

④袁世凯又乞援於英使. 申报,1912-02-12,第1张第3版。

然。所以,与其说西方列强和立宪派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帮”助其取得了政权,倒不如说帝国主义和立宪派站在自己的一边,站在利益的一边,是在帮助他们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显得更合适,更准确,更恰当。

#### 参考文献:

- [1] 章开沅. 革命日记[C]//辛亥革命史丛刊(第5辑). 北京:中华书局, 1983:188-189.
- [2] 骆惠敏.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M]. 北京:知识出版社, 1986.
- [3] 劳祖德. 郑孝胥日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93:1 350.
- [4] 李明吾. 高平的干草运动[C]//辛亥革命回忆录(5).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1:194.
- [5] 苑书义. 中国近代史新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336.
- [6] 李书城. 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C]//辛亥革命回忆录(1).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1:194.
- [7] 张孝若.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30:176.
- [8] 拉尔夫·尔·鲍威尔. 188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C]//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第1辑. 北京:中华书局, 1978:199.
- [9] 章开沅. 辛亥前后史事论丛[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89.
- [10] 王远大. 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M]. 北京:三联书店, 1993:216.
- [11] 张蓉初.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M]. 北京:三联书店, 1957:359-360.
- [12] 郭廷以. 近代中国史纲(上册)[M]. 台湾:南天书局, 1994:405.
- [13] 邹念之.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109-110.
- [14] 柴德赓. 辛亥革命(8)[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 [15] 于右任. 于右任辛亥文集[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218.
- [16] 胡汉民. 胡汉民自传[J]. 近代史资料, 1981(2):60.
- [17] 中国社科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孙中山全集(第1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18] 中国社科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孙中山全集(第2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19] 谭人凤. 石叻牌词叙录[J]. 近代史资料, 1956(2):59.
- [20] 柏文蔚. 五十年经历[J]. 近代史资料, 1979(3):25.
- [21] 蔡寄欧. 鄂州血史[M]. 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1978:130.
- [22] 刘厚生. 张謇传记[M]. 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1958.
- [23] 章开沅.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316-317.
- [24] 张国淦. 辛亥革命史料[M]. 上海:龙门联合书局, 1958:269.
- [25]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 辛亥革命资料[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567.
- [26] 胡滨. 英国白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167.
- [27] 来新夏. 北洋军阀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0:198.

## The Reason for Compromise among the Qing Dynasty, Sun Yat-sen and Yuan Shikai in 1911

DING Jian, LI Jin-quan

(History Cultural College i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In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Qing government, Yuan, and Sun made a compromise, on which relevant research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on this problem and makes a new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not a new point of view with new evidence, but an effort to grasp the whole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inner logic after the Wuchang Revolution, in order to reach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is period of history. In the complex social contexts, their compromise is very necessary, which nothing can hold. Their compromise not only i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subjective conditions, but is also actively contributed b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Key words:** in 1911 revolution Yuan Shikai; Sun Yat-sen's; the Qing Dynasty compromise

[责任编辑:孟青]